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主 编 聂珍钊 副主编 王松林



1913: 现代主义的摇篮

1913: THE CRADLE OF MODERNISM

让-米歇尔·拉巴泰 (Jean-Michel Rabaté) © 著

杨成虎 等 © 译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013036429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

主 编 聂珍钊 副主编 王松林

I109.4

02

1913: 现代主义的摇篮

1913: THE CRADLE OF MODERNISM

让-米歇尔·拉巴泰 (Jean-Michel Rabaté) © 著

杨成虎 等 © 译



I109.4
02



北航

C1642812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05488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13: 现代主义的摇篮 / (美)拉巴泰著; 杨成虎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ISBN 978-7-5446-3016-0

I. ①1… II. ①拉… ②杨… III. ①世界文学—近代文学—文学史—研究—1913
IV. ①I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2690号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1913: The Cradle of Modernism*, ISBN 978-1-4051-5117-7, by Jean-Michel Rabaté,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

本书由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图字: 09-2011-123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蒋浚浚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字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3016-0 / I · 0227

定 价: 49.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编委会名单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

顾问：陈众议 玛乔瑞·帕洛夫 庄智象

主编：聂珍钊

副主编：王松林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仁

史惠风

吴笛

陆建德

陈红

陈建华

罗良功

胡亚敏

胡全生

隋刚

曾繁仁

蒋洪新

谢群

总序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是一套学术翻译丛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的院士中，选择9位院士的文学批评力作，译介给中国学术界。所选内容涵盖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尤其对当代美国诗歌批评的学术成果做了重点译介。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批评界大量翻译介绍了国外的文学理论著作和思想著作，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外国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相比，对外国某一领域的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专论的译介还有待加强。这套丛书产生的初衷，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弥补。本丛书力图通过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精心之作的翻译，向中国学术界展示“理论热”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家如何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有效的批评。与一些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不同，在这些出色的学术研究中，文学的边界不仅没有消失，文学本身不是正在死去，而是以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生，充满了活力，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永恒魅力。我们从这套丛书中还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负责任的批评家不能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去曲解文学、误导读者甚至去毁灭文学，而应该通过批评与阐释，探索文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文学，从中得到教诲。这一点对于我国文学批评中盛行的文学经典的戏说和大话倾向，其警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美国文学批评领域的成就，编者期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建设有所启示，进而推动我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创办于1780年，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个组织每年都要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选取当代最杰出的人才成为该院的院士。在230余年的历史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公共管理等各领域一共选举产生了4000多位美国院士和600多位外籍院士，其中包括2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00多位普利策奖获得者。目前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含语文学学者)且仍然健在的院士仅有169人，他们均是当今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文化理论及批评方面的顶级专家，其学术思想在美国及世界文学和文化批评界都有着重大影响。

20世纪堪称是一个“理论的世纪”。建国以来，国内出版界组织力量翻译了大量外国文艺理论经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意义重

大。这两套丛书的选材范围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至现代的文学理论,几乎囊括了国外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对我国的文学研究和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引入中国,如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以社会和历史为出发点的审美批评、在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批评、在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原型—神话批评、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文体学基础上产生的叙事学批评,还有接受反应批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等。这些批评是我国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批评方法,形成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造就了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可以说,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极大地开阔了我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使我们的研究走向深入。然而,在一阵阵理论热浪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文学批评偏离了对文学的批评。有一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现了某些理论自恋(theoretical complex)、命题自恋(proposition complex)、术语自恋(term complex)的严重倾向。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某个文化、哲学或美学命题的求证,造成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用时髦的话说,被解构了、被消解了),自身的意义消失了,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己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自我演绎。文学的意义没有了,自然文学的价值也就没有了,其结果必然是文学的消失导致文学批评家的自我消亡。这种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一些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如德里达、利奥塔、拉康、赛义德等人的理论的误读或消化不良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时还没有为中国学者提供充分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范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选择了9部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力作译介给读者,试图展示当前美国文学批评界“理论热”之后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学术洞见之上的另一幅批评图景。

自20世纪90年代起,盛行于美国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在美国学界遭受冷遇。对于美国大学英语系名目繁多的理论课程,赛义德十分不满,将其称为“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2006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时任主席、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也针对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的泛文化批评乱象告诫同行们说,大学的文学批评教授们可能是在“没有适当资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的……而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医生、律师等必须掌握一套知识后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本行业的工作,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往往被默认为没有任何明确的专业知识”(参见威廉·崔斯:“英文系的衰退”,《美国学者》2009年秋季刊)。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罗伯特·斯科尔斯也将大学英文专业的衰落归咎于理论的过度膨胀。在不少专家看来,那些花样翻新的时髦理论消弭了文学的人文价值,抽空了文学的道德情感内涵。美国国内的这一反“理论热”现象很快引起了我国文学研究界有识之士的注意,并引发了对“理论热”之后的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热烈讨论。例如,本世纪初我国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与讨论,就是在理论热之后对文学理

论与批评的深度反思。我们认为，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批评，因此文学批评不能离开文学文本。只要脱离了文学，不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分析和解释，文学批评根本就无法存在。只要脱离了文学文本，所谓的文学理论只能陷于空谈，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反对“不读而论”的概念推理式研究，推崇富有情感交流的、有个人洞见的对文本的解读式批评，主张批评者要担当起文学批评的伦理责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此次翻译的这套文学批评丛书，就是为了给国内学者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学批评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范例。

译丛选取的9部专著，涵盖了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领域，可以说体现了当今美国批评家的创造性思想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其中有3部关于诗歌的专论。《激进的艺术：媒体时代的诗歌创作》的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她站在美国当代诗歌的最前沿，用最敏锐的眼光审视媒介时代的诗歌创作，高擎智慧的火炬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学术天地。她用精深的学识和批判性的研究引导着当代诗歌学术研究的发展，评论家称她是一位“阅读精确、拒绝将艺术的评判权拱手交给教师或理论家”的作者。《语言派诗学》的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查尔斯·伯恩斯坦教授。他是当今美国“语言诗派”的代表诗人和理论家。他从意识形态和审美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美国诗歌特征，尤其是他对语言诗的语言、声音、形式与意义以及政治策略的研究，是我们认识和解读语言诗的一部指南。《诗与感觉的命运》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苏珊·斯图尔特教授。她是美国具有广泛影响的诗人、批评家和教育家，帕洛夫教授、伯恩斯坦教授分别称其为当今“国际最顶级学者”之一和“本世纪文学批评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她的著作援引上至古希腊下至后现代的诗歌经典，论述了诗歌与人类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的内在联系，从艺术审美的高度探究了诗歌艺术在人类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在原来的选题计划中，我们还选择了美国圣母大学吉拉尔德·布伦斯的《诗歌的材料：诗学理论概要》一书准备译介给国内学界。该书对当今美国先锋派诗歌的写作实践做了哲学层面的解读，认为诗歌的意义隐藏在诗的创作和阅读的空间之中，主张读者应该像人类学家那样回到诗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现场去寻找意义。遗憾的是，由于未能获得这本书的版权，我们无法将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

在戏剧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著名莎学专家、前国际莎士比亚协会主席大卫·贝文顿教授的著作《莎士比亚：人生经历的七个阶段》。贝文顿教授是当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莎士比亚专家之一，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他把莎士比亚一生分为七个阶段，对莎士比亚的历史背景、个人生平、戏剧创作及舞台表演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驾轻就熟，思路清晰，说理透彻，成就了这部研究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

在小说研究方面，我们选择了3部著作。耶鲁大学克劳德·罗森的《上帝、格利佛与种族灭绝》从文学人类学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出发，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考究，批判了近五百年来欧洲对所谓异邦“野蛮人”的“他者”文化想象，涉及的作家有斯威夫特、蒙田、王尔德、萧伯纳等，视野开阔，见解独特，启示深刻。霍普金斯大学埃里克·桑德奎斯特教授的专著《福克纳：破裂之屋》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研究了福克纳的作品主题、结构及其与南方神话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福克纳不能不读的著作。爱荷华大学盖勒特·斯图尔特的著作《小说暴力：维多利亚小说的形义叙事学解读》从文体学与叙事学的

角度,就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笔下强大的语言力量的表述与情节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该书研究方法独特,注重文本细读,是近年来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文化批评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戴尔班科教授的《撒旦之死:美国人如何丧失了罪恶感》一书,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一部美国精神传记”。作者对美国过去和现代之间的道德传统的割裂,特别是对美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及精神信仰的匮乏进行了批判,作者也因此而被《时代杂志》评为2001年度“美国最佳社会评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让-米歇尔·拉巴泰教授的《1913:现代主义的摇篮》将现代主义文学纳入1913年这一特殊的年代,详细考察了1913年发生的一系列标志性文学艺术现象和政治事件,如非西方作家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战爆发前最后的世界和平、叶芝和庞德的合作等,从全球文化思想变化及交融的角度审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端,视角独特,见解深刻。

20世纪以来,美国的文学研究空前繁荣,出版了大量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但我们只能从中挑选部分杰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以上译介的著作,都是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同行们在文学研究方面有其突出的优点:方法多样,务实求新,细致深入,特色鲜明。这些专著均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借得认真阅读和参考。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给中国读者的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译丛选择的著述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不易阅读、理解和翻译,因此对于译者而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各位译者做出了巨大努力,希望把这些学术著作翻译得完美,但是由于水平有限,仍然无法达到目标,在此请各位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主编 聂珍钊

谢辞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即将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借此机会首先向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先生表示衷心感谢。陈众议先生长期关注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关心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关心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这套丛书的选题、论证和整个翻译工作，都倾注了他的热情和关心。他的珍贵友谊、热情鼓励、宝贵建议，是我们完成此项工作的动力。还要衷心感谢玛乔瑞·帕洛夫教授。她是这套译丛的顾问，为我们初选的著作提供了实事求是的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评价，为我们联系每个作者和协商版权提供了重要帮助，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都能及时地热情地帮助我们。可以说，这套译丛得以面世，陈众议先生和玛乔瑞·帕洛夫教授是我们最需要感谢的人。

我们还要感谢这套丛书的各位作者，他们是：玛乔瑞·帕洛夫、查尔斯·伯恩斯坦、苏珊·斯图尔特、大卫·贝文顿、克劳德·罗森、埃里克·桑德奎斯特、盖勒特·斯图尔特、安德鲁·戴尔班科、让-米歇尔·拉巴泰。我们不仅要感谢他们同意我们翻译他们的著作并在中国出版，还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提供的各种帮助，感谢他们随时解答译者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相信，他们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国的学者和读者都将大受裨益。我们还要感谢这套译丛的美国出版社，是它们的充分合作和授权，才使这套译丛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还要感谢庄智象教授、副编审孙静女士，以及所有著作的责任编辑。庄智象教授既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也是这套译丛的顾问。这套译丛从选题、翻译到出版，与他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这套译丛也是他特别倾心的一个项目，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一生要做几件有意义的事，而这个项目正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孙静女士是出版社这套译丛的具体负责人，她不断对译丛的翻译工作提出具体指导和帮助，这套译丛倾注了她的大量心血。每部著作的责任编辑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对每部译著都进行了仔细认真的审校，提出十分重要的意见，消除其中的疏忽与瑕疵。我们还要感谢刘华初先生，他负责这套丛书的版权谈判。是他辛苦和有效的工作，为我们奠定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础。还要感谢负责这套译丛的装帧设计的美编，因为是他的精心设计才最终使这套译丛的出版变得完美。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参与这项工作和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所有人。离开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来自各方面的帮助，要完成这样一项大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心存感激。

聂珍钊 王松林

译者序

让-米歇尔·拉巴泰(Jean-Michel Rabaté)，现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作为一位学殖深厚的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当代艺术和哲学等。他著述甚丰，其中2007年出版的文论专著《1913：现代主义的摇篮》(1913: *The Cradle of Modernism*，布莱克韦尔出版社)是现代主义研究的最前沿成果，这部书对现代主义的研究在资料发掘、现代主义的发展理路和概念认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13：现代主义的摇篮》是一部写作方法独特的现代主义思想研究的专著。作者选取了1913这一特殊的年份作为全书的框架，深入挖掘了全球语境下现代主义各个方面的事件和史实，对1913年出现的现代主义端倪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史诗般的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是美国学界现代主义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为我们提供了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一场盛宴，在本书中文学、音乐、绘画、科技、哲学、数学、建筑学、乃至性学与优生学，几乎无所不包。这部书对现代主义的发端以及历史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以丰富的史料、渊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和特别的见解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部书的汉译深化了我们对现代主义的了解和认识。比起以往的现代主义研究著作，这部书显得尤为独特。概括起来，它对现代主义的前沿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色：

第一，多科并举，开拓概念。这部书在概念上突破了传统的文艺理论的范畴，论及了整体的宏观的现代主义思想，开拓了现代主义概念的新范围。一般论述现代主义的著作多集中在某一方面进行讨论，比如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绘画等等，而这部书却是集多种学科于一体来探讨现代主义思想的端倪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可谓视野广阔，内容综合，兼收并蓄，体大思周。这部书与其说是一本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倒不如说是一部现代主义思想的著作。在现代主义思想的框架下，作者论及了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哲学、语言学、数学、物理学、建筑学、科技、政治、军事、乃至性学、优生学等等，合文、理不同学科于一体，说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仅仅表现在人文科学的文艺创作上，同样也表现在如政治、军事、性学、优生学等社会科学和数学、物理学、建筑学、科技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思想和理论发现上，深刻反映了现代主义思潮的超学科性质。作者学术思想的深邃性在于他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还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发现来考察现代主义思想。他在第三章“日常生活与新认识”的第一节“科学精神及其不满”中指出，恰恰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发现产生了与传统告别、观念更新的现代主义思想意识：奥地利物理学家

和哲学家厄恩斯特·马赫早已预料到了从稳定物质、可预知的吸引以及逻辑因果基础上的整体世界观念到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公式所统治的相对宇宙观念的演变，他是第一个抛弃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科学家。他认为，从宇宙范围上讲，物体的惯性不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而是由宇宙中无数巨大的天体对该物体的作用所产生的。马赫还提出了许多光学、力学和波动力学的重要原理；马赫的这些原理都得益于他认为知识是由感觉经验数据形成的概念组织，而这正是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

与此同时，作者对现代主义的思想端倪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书中论及了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奥弗斯主义、涡旋主义、野兽画派，乃至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等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并将它们的情况还原到1913年前后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这些方面的考察说明了现代主义并不局限在文艺研究的范畴。

第二，文理史哲，综合治学。文史哲三方面综合的学术研究原本是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传统学者治学的一大特色，而近代西方学者基本上是对学科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现当代西方学者对学科的分类更为细致，学者基本上成了某一方面研究的专家，造成了学科间的壁垒和杆格，以至于同一学科不同方向的研究者互不理解对方。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部书的作者雄才大略，总揽全局，对早期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综合研究。这种综合各大科学的现代主义思想的文理史哲研究方式已经打破和超越了中国传统学者的文史哲综合研究局限于文科的局面，实为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一种超学科性质的治学方式。书中所涉及的数学、物理学、建筑学、科技等自然科学以及政治、军事、性学、优生学等社会科学与文学、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人文科学一起，在早期现代主义思想的层面上进行了知识重构(knowledge reconstruct)，这正是超学科的治学方法。同时，作者明显是将早期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初的一种哲学思潮来看待的，而哲学乃是各学科研究的理论思想的概括和提升而来的最高层面的学术。可以说，作者是在这样一个层面将以上所提到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统一起来，并进行知识重构的；同时，作者又将早期现代主义置于1913年这一历史阶段之中来考察，实现了文理史哲这一新的综合研究模式。在这样的研究模式中，作者通过历史资料的挖掘，运用1913年前后大量的人物、事件、趣闻和轶事，生动而又机趣地记述(同时也论述)了现代主义精神，讲述了现代主义从旧的母体里诞生的阵痛和这个“新生儿”的个性和生命力。这种将学术研究和难以把握的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讲成让人爱听的历史故事的治学方式实属作者的首创，这也是这部书题目的深意所在。作者的这种“史家笔法”除了将枯燥而又抽象的现代主义思想通过人物和事件进行有趣的论述和阐释以外，还起到了客观公允地以史评学的作用，对早期现代主义的历史价值问题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

第三，夹叙夹议，以史立论。夹叙夹议本来是记叙文和某些小说的写作风格，一般学术著作采用的都是客观严谨的逻辑论证方式，而不采用这种文艺性的写作方法，然而，这部书的作者可以说具有独特的智慧，打破常规，将这样的写作风格移植到他的学术著作的撰写中来，开创了学术著作写作文体的新形式，为今后学术著作的写作提供了新样本。这部书对人物、事件、文献以及作品等史实的引入方式丰富多样，有独立成段的引入，有截句截词的引

人。除了直接引入以外，还有间接的引入。作者引入的目的是为了对引入对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为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作者的每个立论都以大量的翔实的史实为基础，可谓持之有据。这样的立论不但表现了作者功底深厚、学风踏实，而且也体现了这部书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此外，这种新形式还打破了学术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界限，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学术写作也具备了小说创作的“复调”效果，为作者打破界限的现代主义超学科研究模式找到了切合的撰写方法。请看第八章“现代主义和怀旧之情的终结”中“华顿的再婚喜剧”一节的一个选段：

1908年5月，她[华顿]沉浸在婚外情的喜悦中，最终发现了肉体的快乐，华顿注意到：“在‘善恶的彼岸’，一下子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这有多奇妙哇！”就在那个春天，她一口气接连读了《善恶的彼岸》、《权力意志》和《道德的谱系》。昂汀是尼采式的女主人公，在为独立和自由而奋斗时，她不惧怕打破秩序的外表形式。她的武器是社会为女人提供的杀手锏——美貌。小说多次回响着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Umwertung aller Wert）。昂汀一次次发现，“所有原先被认可的社会价值又被倒置了”（《风俗》，第180页）：每一次某个稳定措施确立后，昂汀都需要将它推倒，从而走向另一层次。在力图掌握法国贵族规约的过程中，她学会了不将地位与美貌联系起来，她在纽约就是这样天真地做的，然而她发现社会地位的提升与道德并不对应：“但就她[埃斯特拉蒂娜公主]竟然也吹牛说与阿黛尔申夫人十分亲密，并以此为借口来给自己取名，这就推翻了昂汀的等级观”（《风俗》，第242页）。

这里将尼采著作的名称和《乡土风俗》的原文等引入作者自己的行文中，一系列的界限都被取消了：《乡土风俗》小说外的作者华顿与小说里的主人公昂汀在精神生活上的界限被取消，她们都是相同的命运。华顿在读完尼采的《善恶的彼岸》后，自己也达到了“善恶的彼岸”，她与尼采的精神感觉的界限被取消。她与她小说里的昂汀以及尼采又都在“重估一切价值”这一现代主义思想中进行着相同的思想实践，这样，尼采、华顿和昂汀三人的界限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一致而被取消。文中还写道，埃斯特拉蒂娜公主与阿黛尔申夫人取的也是相同的美名。也就是说，不同人之间的界限还可以通过取相同的名字来取消。

这种写作样式还将叙述与议论的界限也取消了，形成了叙述中含有议论、议论中也含有叙述的互含态势。在形式上的叙述与议论的界限取消的同时，内容上的人物、名称以及思想的界限也随着被取消了，最终实现了这部书在现代主义这一哲学思想的高度上打破各种界限的“大融合”。

通过对这部内容宏富的学术著作的翻译，让一米歇尔·拉巴泰对早期现代主义研究的苦心孤诣给我们几位译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杨巨源诗）从细致入微的剔罗爬抉到对现代主义研究的嘎嘎独造，这部书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表达严谨、语言机趣、心手相移、潜心治学的学者形象。翻译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了解、研究、欣赏

和重新表述这部著作的过程。我本人承担了绪论和第一章的翻译，周洁老师承担第二章的翻译，后面各章分别由我们的研究生汉译第一稿，然后由我修改、校正和统稿。其中徐方芳负责第三、四章，赵力瑾负责第五、六章，胡祖珺负责第七章，谈少杰负责第八章，乔璐璐负责结论部分。学术著作翻译的标准和要求不同于文学作品，客观严谨的原文学术语言如何在汉语中得到应有的表达，特别是一些尚无现成译名的概念、人名、地名和书名等，以及除了英语以外的法文、德文等其他语言，在汉译遣词造句过程中，我们为了“忠实”和“通顺”的翻译标准，可谓殚思竭虑，“为立一名，旬月踌躇”，也不知道这样是否达意了。“奇‘书’共欣赏，疑义相与‘译’。”我们目前向读者朋友呈现的这个译本，也恳请各位学者方家切磋和批评。

杨成虎

2012年12月5日于宁波大学文萃新村竹云轩

致谢

本书作者及出版商承蒙慨允复制以下版权资料，特为致谢：

引文：

“长眠于此”，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作，新方向出版社(美国版权)，卡尔卡内特出版社(英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版权)。

“在地铁站”，埃兹拉·庞德作，新方向出版社(美国版权)，法伯尔与法伯尔出版社(英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版权)。

“喇叭”，罗伯特格伦尼尔译，罗伯特格伦尼尔授权。

“彼得堡诗节”、“1913年”，奥希普·曼德尔施塔姆作，选自《石》，罗伯特·托拉希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沼泽体”，达尔林·J·萨德里尔译，见《费尔南多·佩索阿简论：现代主义与作者身份的悖论》，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

本书尽力寻找所使用版权资料的版权所有人，取得他们的授权。以上列表中如有任何错误和遗漏，出版商均表歉意，如有方家指正错误，我们深表感谢，改正意见在本书今后再版中纳入。

最后，我要感谢艾里克·布尔逊，是他拨冗阅读本书书稿，并提出了无数有益的建议。

目录

译者序	I
致谢	V
绪论：现代主义、危机与早期全球化	1
第一章：艺术中的新观念	15
第二章：集体力量	37
第三章：日常生活与新认识	59
第四章：1913年学会现代	79
第五章：全球文化与他者的出现	97
第六章：现代主义的分裂主体	115
第七章：与自己作战：德国与奥地利现代主义最后的世界之旅	135
第八章：现代主义和怀旧之情的终结	153
结论：多种对抗	171
原文注释	179

绪论

现代主义、危机与早期全球化

会不会是1913这个年数让我们厄运加身？我之所以专论1913这一年头以探讨现代主义的端倪，倒不是因为，回眸历史，这一年似乎是最后的和平年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随后就燃遍了世界，或是这一年似乎彻底结束了法国人过去常说的“美好时代”和美国人所谓的“镀金时代”。依照法国和美国人的看法，1913年返照了一个自我满足的旧世界的所有回光，人们都尽情地享受着那份来之不易的优待和一场工业革命的成果。我并不把这一年当作最后的天真时光（虽然以前也曾给我这样的美好感觉），相反，我现今意识到，更确切地讲，这一年可以说是我们现代全球化阶段的元年：1913年，人们已经感觉到一股牵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力量在热情高涨的人群中蠢蠢欲动，这股热情创造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文艺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得出共识：虽然这一年给世界带来了厄运，但也永远改变了我们对新旧观念的感知。

1912+1

实际上，最为敏感的见证者、目光更为犀利的艺术家和高级知识分子1913年都相当程度地感觉到这一点了。莫顿·富勒顿(Morton Fullerton)先知先觉，于1913年出版了一部书，提及了费恩斯伯格村一个老妇给普鲁士王储威廉一世的预言，老妇断言，日耳曼帝国将于1913年灭亡。^[1]这一不祥之兆也为列昂纳多·夏夏¹所感知，他为这一年专门写了一部文字优美且内容简洁的小说。^[2]夏夏得到了一本邓南遮²所著的《圣塞巴斯第安的殉教》(Le Martyre de Saint Sébastien)，这本书此前是邓南遮赠给一个朋友，上面题写着一句警言妙语(“每一支箭都是为了救赎”)，落款和年月日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912+1年6月7日。这便激发了他的灵感。这远不止是作者迷信，或让读者迷信，它表达了一个想要在1913年延续1912年的愿望。《圣塞巴斯第安的殉教》经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改编为芭蕾舞剧并由伊达·鲁宾斯坦(Ida Rubinstein)在巴黎上演后，1911年确已演出多场。不幸的是，观众都认为演出虽然场面盛大，但却是失败的：剧本歌词浮而不实，絮叨冗长，带着印象派革新的硬伤，无可挽回。这是德彪西第一次失败的公演；这一硬伤显示了这位作曲家已经债台高筑，他的第一次婚姻很快破裂，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1900—1909这无忧无虑的10年间，文化之旅在巴黎发展到了巅峰。整个巴黎城似乎都

¹ 列昂纳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 1921—1989)，意大利作家、政治家。

²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邓南遮也是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是墨索里尼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沉醉在该城特有的节庆气氛之中，歌声绵绵不断，奥芬巴赫¹的曲子从《巴黎人的生活》(*La Vie Parisienne*)一直唱到《美女海伦》(*La Belle Hélène*)。与这10年相比，1912年却被蒙上了加深的阴影：又是武装冲突，又是重整军备，又是招兵买马，巴尔干战事在中欧前线正阴云密布。

颇如麦迪瑞斯·埃克斯坦斯(Modris Eksteins)在其名著《春之祭礼》(*Rites of Spring*)^[3]中所显示的，音乐、绘画和文学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微妙变化。对埃克斯坦斯来说，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²芭蕾舞剧《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首演打开了现代主义尚古洪流的闸门。在这股洪流中，人们心知大战已是不可避免。斯特拉文斯基曾将其芭蕾舞剧命名为“受害者”，他给人最大的惊讶是让那个命中注定要做牺牲品的年轻姑娘同意自己杀身成祭。这里，在沉思“尚古的”祭礼时，我们认识到，那就是创造与毁灭已然不可分离。不仅艺术领域在酝酿一场大革命的艺术运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我在下一章还会回头再论斯特拉文斯基的著名芭蕾舞剧。这里，我要特别说起另一位带来革命的音乐家，他曾是这位俄国音乐家的朋友，但却给音乐带来了更为持久的变革。阿诺德·勋伯格³于1908—1911年开始试验自由无调性音乐的时候，他既受到内在需要的驱使，又受到德国表现主义作家的影响。1909年的德国独角戏《期望》(*Erwartung*)就是开创新气象的一个典型。这部歌剧的歌词为贝尔莎·巴本汉姆(Bertha Pappenheim)的一个亲戚玛丽·巴本汉姆(Marie Pappenheim)所写，她就是弗洛伊德(Freud)和布鲁尔(Breuer)所著《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书中的“安娜·欧”。歌词是一个女人的内心独白，这个精神错乱的女人最终发现自己因为醋意大发谋杀了情夫。开场时，她分不清哪是林子，哪是尸体，她这些幻觉和极度痛苦的诘问出现在与情夫的一系列分别之中，每次幻觉后都跟随着一段音乐，每段音乐都持续了几秒钟，然后在一个高潮的地方停住；没有明显的主题推进；那有节奏的结构不断变化；这种快速变化给人的印象是，一段完整的生活几秒钟就展现完毕。^[4]

这部舞剧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勋伯格相信迷信。他厌恶13这个数字，平常计数时，他都不计13，就连书籍中的第13页也常常重新编号。他甚至极端到将他《摩西和亚伦》(*Moses und Aron*)剧名中“亚伦”的德文拼音删去一个“a”字母，这样，剧名的三个单词只剩有12个字母。他这一迷信的计数法和他战后决定通过创立十二调技术将无调性音乐系统化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20年代，他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古典主义，这便将一个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古老迷信变成了作曲的必要规则，变成了新音乐的法则。确确实实，勋伯格生于12月13日，但他害怕会死在某月13日的一个星期五——而他偏偏就死在1951年7月13日星期五。^[5]我马上会通过阿道尔诺回到战后勋伯格“革命”音乐和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音乐有明显差异这一问题上。早先，他们二人仍在合作时，斯特拉文斯基可能已知勋伯格害怕13这个数字。毕竟，就

¹ 约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创始人之一。

² 伊戈尔·菲德洛维奇·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dorovich Stravinsky, 1882—1971)，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奥拉宁堡(今罗蒙诺索夫)，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

³ 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